

花城丛书

王西彦早期作品选

悲凉的
乡土

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 范汉生 叶曙明
装帧设计 陈君生

悲凉的乡土

王西彦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125印张 3插页 290,000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30册

书号 10261·146 定价 1.30元



作者像

自序

从最初学习写作时起，我就对文学有着一种白痴的偏爱，也由此建立起了写作的信念——文学也就是对生活的反映，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该是描写生活的真相。因此，写什么文学作品的问题，自然也就只是先在描写生活真相时所达到的程度（质量）。这个浅显的道理，即使对一般文学作者来说，也许也是常识性的常识，未免过于简单明白，但对我进入大学后的青年时代来说，情况却又复杂得多。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知识界的思想斗争已经激烈起来，文学上的种种界限和流派也被划分出来，使文学上的许多问题都一下子变得非常不透明而花团锦簇，莫衷一是。它给你以荒茫失措，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对待选择道路时，它又给你以影响，不但成了我的榜样，同时也给你约束。我按照自己的说：“你看到，却不是理解的只是如此，你只是跟着走进去罢了。”记得有一个时期，我曾浪费过很多的时间，像从一潭死水中学人的数量里，从《红楼梦》和《红楼梦》里面找

书话集（20X25）精品书局

王西彦手迹

前 言

王西彦先生是我国当代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非常善于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普通的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表现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无比同情和对于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他的作品笔触清淡，但感情深沉，读后往往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次，承蒙王西彦先生在百忙当中亲自为本书选编作品，并执笔作序，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所选作品，均系王西彦先生早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我们希望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对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1952.5.22

自序

从最初学习写作时起，我就坚守着一个对自己曾经起过指迷引路作用的信念——文学艺术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就应该是描写生活的真相；因此，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自然也应该是它在描写生活真相时所达到的真实程度。这个粗浅的道理，对现在一般青年作者来说，也许是最起码的常识，未免过于简单明白。但在我还是入世未久的青年的那个时代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那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知识界的思想斗争正趋剧烈，文学上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正被介绍进来，使我这个身上还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年青人感到眼花撩乱，莫知适从。正当我惊慌失措，不知道应该怎样来选择道路时，先驱者的身影不仅成了我的榜样，而且给了我勇气。我鼓励自己说：“你看哪，那不是鲜明的足迹吗？你就跟着走过去罢。”记得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趁课余时间，躲在一间空无旁人的教室里，悄悄地把《呐喊》和《彷徨》里面那些描写浙东农村生活的名篇，虔诚地抄写了一遍。当然不是由于买不起那两本书，而是为了自己

能够咀嚼得更细致，体味得更深切。也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前辈，当时我已经通过初期的译文，读到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我曾经在读书笔记里记到自己最初从英语课本或英语活页文选里读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询问》的英译以后，怎样如饥似渴地找寻这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作品并竭力去理解它们的情形：

“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时，眼前一直浮现着契诃夫那副善良而略含讥刺的笑容，那自然是从一些翻印过来的契诃夫像片上得来的印象。我总觉得，这位乡村医生是在怎样用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病态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病态人物呵！不说别的，单看出现在他笔下那些小官吏，那些庶务官、巡官、预审官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卑下可怜，他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庸俗可笑。而这些人物，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产物。”

后来，我又在契诃夫的书简里读到 he 关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名言：“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象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您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契诃夫的名言，不就是和鲁迅不满中国“瞒”和“骗”的旧文艺，并说他自己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有时更在自己的作品里涂上“亮色”的主张相一致吗？我想，自己既然立志当这两位前辈的小学徒，也就

应该按照他们的主张和实践去做。首先，我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契诃夫对现实主义的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其次，还要使人感觉到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只有做到了前一点，才能做到后一点。

这就是我长期遵奉的主臬，毕生追求的标的。

在这个集子里，我把描写浙东家乡的几篇作品编排在前面，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它们的写作日期比较早，另一方面却也由于我对它们有着特殊的亲切感。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家乡农村里度过的，当我提笔学习写作时，关于家乡的见闻就成为所能采取的唯一题材。尤其是，有谁能够忘记自己的乡土，不对乡土抱有深切的感情呢？在我的观念里，乡土是和母亲相联系的，对乡土的感情也就类似对母亲的感情，或竟是同一的东西。直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白发如麻的老人了，我还依恋着自己的童年，记忆里还保留着过去那个充满叹息和眼泪的乡土的悲凉景象。正在那时，我读到了西班牙作家比阿·巴罗哈(Pio Baroja)风格别具的《山民牧唱》，它用一种仿佛从特异的乐器里弹奏出来的凄凉调子，描写那些没有人保护却将被拉去当兵保护别人的烧炭人，失去了男人过着孤寂无助的日子的寡孀，被人叫做“地狱的巴提”的看坟人，抱着病孩子到处求医的母亲，陷入贫困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的产妇，因接触到人世间广大的悲惨而发了“善心”的“坏女人”，使我心胸充满凄苦，眼眶充满热泪。西班牙的国土不是离开我们很遥远吗？发生在那里的不幸的故事，

为什么和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样呢？人世间的悲哀为什么竟这样广大无垠呢？其实，我已经读过写了《猎人笔记》和《木木》的屠格涅夫，读过写了《苦恼》和《哀伤》的契诃夫，也读过写了《故乡》和《祝福》的鲁迅，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名著。可是，《山民牧唱》仍然给了我很大的激动，仍然使我产生上面所说那种近于小孩子的天真的想法。并不是对于造成不幸故事的社会原因茫无所知，而是把自己身经目睹的事实和那些文学大师们手笔下的描写两相印证后所引起的惊讶和痛苦。不待说，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学习。

容纳在《悲凉的乡土》这个题目下的四个短篇，写作的时间略有先后，最初也发表在几个不同的刊物上，现在我把它们集拢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有人也曾经读过《山民牧唱》，就不难发现当时我是在怎样向自己所尊敬的前辈们学步。无论是讨血钱的奶娘，在明亮的月光下被送去出卖的村女，因严重旱灾的逼迫而变成藐视神灵和“王法”的庄稼汉，身心备受蹂躏却只能饮泣吞声的童养媳，他们都是我童、少年时代所身经目睹的，在写作时眼前一直浮现着他们悲戚的面容。另一篇《苦命人》，写的就是我自己那个童养媳出身的母亲，连故事情节也大体上是实在的，记得写作的动机也就是为了纪念早离人间的苦命母亲。只有《爱的教育》所依据的，虽然也有童、少年时代在农村私塾式国民小学里的经历，但主要的已是进了省城一所师范学校后在城市小学校里的见闻了。同一时期的同类作品，还有收容在另外两个选集里的几篇，它们就是《车站旁边的人家》、《摸秋》、《报复》、

《鱼鬼》和《寻常事》。重读这些明显地留有一个初学写作者的幼稚相的作品时，我同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当时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可是你看吧，在他心目中的乡土竟是那么阴暗，那么悲凉！聊堪自慰的是，我是的确在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而且，我还以为，这样做了，至少能使人感觉到生活不应当是那样的，从而也就容易得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结论的吧？

我的童、少年时代虽在浙东农村里度过，写作学习却是在北方故都开始的。第一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的初稿写于杭州，但到北平后才把它修改好投寄给天津的一家报纸。那是一个风云紧急的年代，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动荡不安的境地，故都的青年学生发出了“北平城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呼吁。我原来蛰伏在一条灰暗小胡同内的一间灰暗小房子里，抄写着浙东家乡农村生活的记忆，但也感到时代风雨的袭击，不得不走上街头去参加抗议的队伍。我又身经目睹了不少发生在那古城里的特异现象。如果把那些特异现象做好记录，充当素材，到了一位文学巨匠的手里，可以构成一部篇幅浩瀚的《人间喜剧》。长期以来，我也曾不仅有过一个规模较大的构思，还写下了部分初稿，企图反映那个给了我如此深刻印象的伟大时代；可惜人事倥偬，诸多干扰，始终未能实现初衷。留在当时的习作里的，只有收容在另一个选集里的《忧郁的古城》，一篇由三个短篇所组成的较长的小说，以及选编在这个集子里《夜店》以下的五个短篇。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夜店》和《找寻道路的人》都是一位朋友的故事，他是当时所谓“流亡学生”中的一个，从关外流落到关内来，过着漂泊无依的日子。他几次进出关内外，始终找不到一个吃饭处。《夜店》就是他一次出关的经历，原来的诉说很生动，到了我的笔下就变得异常枯燥乏味，也失去了应有的地方色彩。这对我是一个教训，使我以后再也不敢去描写生活经验以外的题材。

如果要给自己的写作生活划分阶段，不妨说，抗战的最初几年可以算作第二个时期。身经目睹了故都北平的种种特异现象，对抗战的爆发，我的确曾经怀抱过热望。但当我参加了鲁南苏北前线战地的民运工作时，却痛切地感觉到一个亟需回答的严峻问题——究竟谁在流血抗战。在另一个选集的序言里，我把《眷恋土地的人》、《麻舅舅丢掉一只胳膊》和《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三篇作品，说成是“表现同一主题的一组”。收容在这个集子里的《四个鸡蛋》、《荒村》、《遭遇》、《仇恨的生长》和《在路上》等五篇，也重复着同样的主题。在编选时，有一位十分关心我作品的朋友看了这几篇稿子后，用一种糅合着责难和惋惜的口吻对我说：“唉，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写得这样苦呢？”

是的，我的确把他们写得太苦了。这里所说的“他们”，指的当然是出现在这几篇作品里的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可有什么办法呢？尽管有人在那里高喊“全民抗战”之类的口号，但我在战地上实际见到的，或者说，给我印象最深的，

却是农民和士兵们的受苦和流血。而且，这种受苦和流血，看起来竟是没有赎偿的。说是保卫自己的土地吗？可是，大片大片的土地——这上面布着他们相依为命的泥屋和庄稼——在一种近于无抵抗的情况下抛弃了。说是发扬民族正气吗？在当时的前线已经出现了所谓“摩擦”现象，后方更已经出现了发国难财者。既然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我记得很清楚，农民们热烈眷恋土地的感情，曾经遭受过怎样残酷的蹂躏。炮声近来了，轰炸增多了，有武器的兵爷后撤了，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庄稼汉眼看着正当成熟期的麦子就那么荒在地里，任凭成千上万的队伍匆匆蹂踏着向南逃跑，请设想一下他们痛惜的心情！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给拉去运送弹药物资了，却留下一家老小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也有的人驾起牛车或撑着木船，想带着妻儿子女和牲口逃避到一个安全地方去，结果却如果不是在轰炸中丧了命，也往往只能凄凄惶惶地重新回转自己的村寨，因为前面并没有可走的路，敌人的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至于那些在保甲长的淫威下被捆绑着送往前线的士兵们，我曾经在一处战场附近的车站废墟里听过他们受伤残后的咒诅。就在不远的一个市镇里，他们用血骨之躯抵挡住敌人倚仗优势炮火的进攻，而且暂时地把疯狂的进攻者击退了。后方大城市里的报纸上正在大事吹嘘这场难得的胜利，他们这些身负重伤的兵士却被抛弃在这残砖断墙之间，伤口不仅还在流血，且已开始溃烂。他们完全失去行动的力量，有的已经奄奄一息，却既没

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得不到任何关心和救治。他们中间也有来自浙东农村的，我听得懂正用家乡的土音在那里作最后的呻吟和发泄怨恨的咒骂。等不到即将来临的敌人的反扑，他们就会流尽最后一滴血，呼出最后一口气……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只要在记忆里重温那悲惨的景象，我就禁压不住自己的悲愤。因此，重读当时写下的那些近似速写或战地报道的作品时，我只遗憾于自己写得太少，且也写得太肤浅，太浮光掠影了。

鲁南苏北是这样，那么浙东的情形又将是怎样呢？这个由联想引起的疑问，许久许久盘旋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到我终于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又一次身经目睹了人民的遭灾和乡土的受难。

去鲁南苏北战地以前，我曾在浙东南海滨的一个小镇上住过一段时间。那里原是一处富饶而平静的地方，虽然渔民们所过的却是艰辛而贫苦的日子。抗战开始后，随着沪杭一带的迅速沦陷，这里也受到敌人的骚扰。沿海一些渔村，不时被从海上袭来的炮弹所击中。出海的渔民，除了险风恶浪，现在又出现新的仇敌和灾祸。他们处于徒唤“皇天”（当地村民的口语）的困境，完全得不到保护。但《海的喧嚣》却是经历了鲁南苏北的溃退之后才写下的，战地农民的受难使我痛苦地回忆起浙东南海滨那段日子的见闻。

不过，鲁南苏北的平原也好，浙东南的海滨也好，都不及家乡父老兄弟们的遭遇更激动我的感情。我太熟悉自己悲凉

的乡土了。不管我回到家乡的日子怎样短促，只要看到或是听到一件悲惨的故事，我就能想象到更多的悲惨故事。即使很快就离开了，而且家乡也很快就沦陷了，但那些父老兄弟们悲戚的面容和绝望的呼嚎不仅长期留在我的意识里，同时更开拓着我的想象。我还不断地得到来自家乡的消息。我的一个曾经当过童养媳的亲姊姊，男人死后成了寡孀，就是在敌人一次扫荡时死在他们的刺刀下的。得到这个噩耗时，我好几天夜不成眠，我想到的不只是可哀怜的姊姊，而是更多和她共命运的农村妇女。沦陷前后家乡父老兄弟们的遭遇，迫使我不得不提起笔来。在我过去的写作历史上，至少是在四十年代里，这一时期是写得最多的，题材也主要是得自家乡的见闻。那些作品，大部分已经收入另外两个选集，这个集子里的《玉蜀黍的悲剧》、《疯人》、《一双鞋子》、《罪》和《乐土》等几篇，是在编成那两个选集以后才陆续从当时的报刊上搜集到的。当然够不上说是在给家乡父老兄弟编写他们的苦难史，但的确增加了我对家乡的怀念之情，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感情的强烈程度。

每个作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范围，他们汲取创作题材的源泉。我曾经把这叫做作家的“家园”。如果说，浙东农村生活是我最初的“家园”，那么，这个“家园”就不断有了扩大，或者说，不断开拓出新的“家园”。我指的是，随着自己远离家乡寄身于城市生活，我的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知识分子的身上来。在我的作品里，描写知识分子的题材与日俱

增。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史上的第三个时期。

抗战初期，我曾经以在鲁南苏北战地的经历，写过一篇题为《旷野》的小说，歌颂了一位海燕式的青年女战士，她投身在时代的暴风雨中，展翅高飞。就在这个集子里吧，也还留着一篇《冶炼》，写的也是一位从艰辛的流浪生活里得到锻炼的强者。她们都是有实际的模特儿的，我还有意地保留了她们名字的谐音。可是，你看，从《手持稻穗的人》以后，出现在我笔下的知识分子的面容却愈来愈阴沉了，他们几乎无一不是生活的败北者。不久以前，我曾经为海外的读者编过一个集子，一共选入十篇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的短篇小说，其中九篇都是四十年代的作品，有五篇的题目是《折翅鸟》、《家鸽》、《假希腊人》、《清醒的醉汉》和《一个小人物的愤怒》。我在序言里为自己作辩护，说自己所写的，只是那个波涛激荡的大时代里的一些力弱者，一些“折翅鸟”和“家鸽”，一些“醉汉”和“小人物”，他们逃避狂暴的风雨，徒抱悲愤而踟蹰徘徊；并不是说在时代的暴风雨中没有振翮远扬的雄鹰，鼓翼搏斗的海燕，我也曾描写过雄鹰和海燕的动人姿势，只是在我的描写里，更多的是“折翅鸟”和“家鸽”而已。我还说到，衡量作品的价值，不应该只是题材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作者态度的诚挚和作品描写的真实。现在看来，我的辩护自然并不能算作强词夺理，但需要更进一步剖析自己，承认自己在观察现实时视野的过分狭隘。这种情形，也可以和自己对“谁在抗战”的问题所找到的答案有联系。在自己的生活范围里，我的确太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备

受苦难，看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思想的苦闷。我觉得，只要自己把这些现象真实地写出来了，也就成为一种沉痛的抗议。我还应该坦率地告诉读者，对收容在这个集子里的《父亲》、《牺牲者》和《破了壳的蜗牛》等几篇作品，这一次重读时，我的眼眶不止一次地变成湿润。但无论如何，到了抗战已经结束时，还写下《阴霾》那样的作品，虽然是为了揭示知识分子中的力弱者那种可悲怜的阴暗心理，但毕竟也暴露出作者因视野狭隘所带来的在反映现实上的严重局限。而且，视野的狭隘，归根结底是由于思想上的缺陷。

最后一篇《虎溪行》，是我当时计划写作十篇以历史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仅有的成果。我选择的人物，都是对我们古代灿烂的民族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和作家，他们中间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李清照和曹雪芹那样的稀世天才。可是，在他们那个时代里，却又无一例外地都有着坎坷的遭遇和悲剧性的命运。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我还记得当时曾给自己定下一个过高的指标——既要写活古人，也要从他们身上反映出当前知识分子的处境和精神状态。我还为此查看了不少资料，写下了不少笔记。关于白居易的一篇，更已写好了提纲。我的目的，主要的是借助古人的事迹，抒写自己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面貌。只是由于环境的不安定，而且不久就临近解放了，才放弃原有的计划。现在我把《虎溪行》收在这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回顾那个破产的计划，另一方面也为了督促自己，使自己能有机会采用和过去不全相同的观点，重新完成那个计划。

长期以来，我都在努力解决写作上的一个难题——怎样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原则下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同时，能使自己的作品稍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说“稍稍”，自然是因为缺乏自信。什么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呢？不用说，它就是艺术的美，就是包含在作品中可以导向永恒的诗的美。

很难用明确的语言来说明这种诗的美，它很有些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我曾经用历史的内容和人生的哲理来解释它，自然只能说是个人的一偏之见。根据这个见解，我认为诗的美就是无掩饰的真实，就是对历史 and 人生的最纯真无伪的理解，而且出之于一种最平易朴素的形式。虚假是文学艺术的大敌。不能允许在自己的作品出现廉价的热情和空洞的叫喊，以及一切言不由衷的浮华辞藻。在任何时代里，作家最可贵的品质是无所保留的真诚。

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难免有距离。空悬一个过高的标的，有时甚至会变成对自己的嘲弄。尽管在写作上也经常处于一种全力以赴的状态，却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好象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拖着浑身疲累却难以到达预定的归宿地。在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归因于自己的缺乏才能，因而陷入一个较长时间的郁郁不快。有一位外国作家曾经在他一则饱含诗情的日记体随笔里写道：“小溪在沙地上奔流，在大河面前毫不畏缩，一刻也不停顿，而是以平等的身份，象兄弟那样，愉快地汇合到一起，因为现在它还是一条小溪，可是眼